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学科春秋](#) / [专题述评](#) / [通史、断代](#) / 20世纪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综述

20世纪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综述

2007-05-27 刘国石 高然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 点击: 528

20世纪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综述

20世纪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综述

刘国石 高然

(北华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省吉林市 132033)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

一 概 说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由于各族在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落后,故他们与中原汉族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同时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众多的利害关系,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十六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而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割据称雄的特殊状况,加之十六国相关史料的相对不足,又使得学者们对这段历史重视不够,因而研究也相对薄弱。但总体来看,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于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也很少。30年代以后,相关成果逐渐增多。社会史方面有曾骞的《永嘉前后的社会》(《天津益世报·食货》1936年5、6期)等;民族史方面主要有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4年15期)、李旭的《五胡时代华夷同化的三个阶段》(《食货》1935年2卷10期)、王伊同的《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3期)等;国别史和区域史方面有冯家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1935年3卷11期)等;古籍整理方面有朱希祖的《十六国旧史考》(《制言》1936年13期)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问题,其他方面研究则相对薄弱。

建国后到文革前,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及问题也更加广泛,研究程度也不断深入。共有论文50余篇,相关著作近10部。代表性的著作有樊圃的《西北的少数民族》(三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此前民族史的专著多是集中于对匈奴的研究,马长寿的著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扩展了十六国时期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对以后的十六国民族史研究有着开拓性作用。这一时期的论文,民族史方面有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和《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黄烈《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3期)、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民族的内迁》(《历史研究》1965年6期)等。国别史、区域史方面有王育乐《西凉国考》(《北京日报》1961年6月20日)等。有关考古的成果主要涉及大夏都城统万城、后赵都城邺城及西秦炳灵寺石窟等,主要有俞少逸等的《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0期)、《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1期)、《炳灵寺发现西秦石窟》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文物》1963年10期)等。

文革时期学术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十六国史的研究也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文革以后，十六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时期，在民族方面则有马长寿《氏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林干的《匈奴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冉光荣等编的《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伟洲的《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国别史和地域史研究方面有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南凉与西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齐陈骏等编的《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蒋福亚《前秦史》等。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整理、校勘的著作。

二 思想、文化及社会史

十六国时期虽然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但思想文化并未因此而沉寂，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大一统思想，不但存在，而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对此皆持认同态度，并对当时大一统思想的存在及其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邱久容从当时各政权统治者的统一愿望，各族文化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意识等方面论证了十六国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

由于十六国时期的统治者重视兴办学校并传播汉文化，带来儒学的兴盛。孔毅对北方经学的特色进行了探讨(《十六国北朝经学的发展与成就》，《北朝研究》1995年1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北方文化虽以儒学为主流，但这种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文化已非魏晋之际的原型，而是融入了草原文化之后的文化形态。孔定芳撰文对此进行了较详的论证(《永嘉乱后中原文化之整合》，《中州学刊》1997年3期)。李红艳针对草原文化与山东文化的冲突与合和作了分析，认为十六国时期是两种文化的第一次全面的冲突与合和，这一历史过程的完成是在隋唐(《十六国北朝时期草原文化与山东文化的冲突与合和》，《北朝研究》2000年)。

十六国时期佛教相对儒学来说明显处于弱势，但仍有一定地位和影响，这主要归功于当时一些传播佛教的人物。在论及当时对佛教有影响的人物时，李瑞良认为在佛经的翻译上，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魏晋南北朝的书籍文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李刚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的作用进行了论证，指出这实际上有利于对北方民族杂处的状况进行统治，另一个效果是推进了民族融合，推进了佛教汉化(《试论十六国政府宗教政策》，《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2期)。高生纪论述了十六国时期我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佛教与十六国社会》，《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10期)。侯旭东则认为十六国时期北朝的战乱对于佛教发展作用是局部的，不应估计过高，更主要的原因是其说教对民众具有吸引力(《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张晓连对五凉佛教兴盛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五凉佛教简论》，《北朝研究》1995年3期)。相关论文还有杜斗城《试论北凉佛教的影响》(《民族研究》1997年4期)和《前凉张天锡时期的佛教》(《敦煌学辑刊》1997年1期)等。

十六国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重视建立学校以推广汉文化教育。学者们在研究当时的汉文化状况时大多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当时的学校教育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有罗宏曾的《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对儒学和学校事业的重视》(《历史教学》1983年9期)、施光明的《略论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兰州学刊》1984年2期)等。

关于十六国时期的社会问题，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人口与阶级、阶层等方面。

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流亡。然而其中也有短暂的统一与平时时期，使人口有一定的恢复。面对北方人口这种复杂的变化，学者们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王育民认为十六国时期的人口是一种前降后升的情况，具体说来十六国前期北方人口减耗，十六国后期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的人口在汉魏以来下降的基础上正处于迅速回升之中(《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答袁祖亮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

5期)。袁祖亮则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十六国时期人口的发展呈现马鞍形状况,两头低中间高(《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历史研究》1991年2期;《再论十六国北朝时期人口的有关问题——与王育民同志商榷》,《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3期)。王晓卫对十六国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进行了研究,并对六夷封建化进程做出了评估(《十六国时期中原夷汉人口比例》,《历史教学》1995年7期)。刘汉东研究了五凉时期的河西人口问题(《五凉时期河西人口研究》,《社会科学》1989年4期)。

十六国时期由于政权纷乱、存续时间短暂、民族关系复杂,加之史籍缺乏等原因,都为了解当时阶级状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学者们往往把十六国时期阶级问题放入魏晋南北朝史大框架下去研究。朱大渭从“阶级结构的框架”,“士族制度的形成以及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区别”,“少数民族酋帅阶级地位的升降变化”,“编户个体农民阶级”,“佃客和奴婢”,“屯田户、军户、吏家、百工户、杂户”等六个方面归纳和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阶级状况,其中很多方面应该说是十六国阶级状况的总结和研究(《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相关的文章还有邢友德的《从刘渊石勒起兵看十六国时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河北师院学报》1980年4期)等。

学者们不仅从整体上研究十六国时期的阶级状况,也对具体阶级、阶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涉及较多的则是士族、流民和奴婢问题。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阶层,也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阶层,在十六国时期士族发挥着其他阶级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学者们对士族研究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对其他阶层的研究。在对士族的研究上,既有以区域为对象,也有以某士族个案为对象的研究。对区域士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河陇士族集团。薛金玉、张晓连撰文从河陇地区的社会环境、五凉对士族的政策、士族在五凉政权的地位、五凉士族的特点及其作用、历史影响几个方面论述了河陇士族集团(《试论魏晋时期的河陇士族》,《北朝研究》1999年)。相关的文章还有李军《西凉大姓略考》(《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3期),张秀平《试论十六国时期汉族士族的历史作用》(《浙江学院学报》1984年1期),刘幼生《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晋阳学刊》1990年3期),马德《敦煌的世族与莫高窟》(《敦煌学辑刊》1995年2期)等。有关大族个案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米海平《南凉宗室源贺世家参与北魏政治活动概述》(《青海师大学报》1990年2期)、施光明《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发展道路》(《杭州师院学报》1998年3期)等。

刘汉东分析了十六国北朝的奴婢问题,认为此时的奴婢在身份、地位上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是,不少奴婢在政治、经济、权势等方面反而会超出一些社会其他阶层,至于一些奴婢上升到统治阶级中,也不乏其例(《十六国北朝奴婢身份地位特点探论》,《北朝研究》1996年1期)。

三 民族关系史

关于十六国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成果颇多。全面研究十六国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民族问题的有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等。黄烈在书的上编中对羌族、氐族、南匈奴、乌桓、鲜卑、卢水胡等的发展变化及社会结构、社会性质、所建政权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并从纵向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各族进行了探讨。在下编,作者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主要涉及民族融合、民族政权与民族战争问题,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西域各族与内地关系,西域道路的变迁,道教的西传等问题。黄著重视从理论方面研究,而白著则更注重史实的论证。

集中研究某个民族的成果,主要涉及匈奴和鲜卑。对匈奴史研究,当首推林干《匈奴史》。该著对十六国时期匈奴的分布,建立政权及其过程,匈奴的消亡等都有详细论述(《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唐荣俊对于匈奴在十六国时期的活动及其衰亡也有类似论述(《谈谈匈奴的兴衰》,《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5期)。

最早对鲜卑族进行全面研究的当首推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书中对鲜卑族的发源地——鲜卑山的确切地理位置作了详细的论证,认

为清代地理学家张穆《蒙古游牧记》鲜卑山在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勒河附近之说大致是可信的。

自从拓跋鲜卑石室遗址被发现后，史学界对东部鲜卑起源的进行重新探讨。陈连开在《鲜卑山考》（《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3期）中，对诸部史籍中所载的鲜卑山进行了新的考证。不过其观点基本与马长寿相同，只是语言表述更为准确。米文平继其《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一文之后，又对鲜卑族源及族称进行了探讨（《鲜卑源流及其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3期）。林干也对鲜卑族的族源和名称进行了论证（《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92页）。相关论文还有孙进己《鲜卑源流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3期）等。

学者们对鲜卑族语言也进行了考证。相关成果有方壮猷《鲜卑语言考》（《燕京学报》1930年8期）及冯继钦《试论鲜卑族的共同语言》（《北朝研究》1992年4期）等。

学者们从地域角度和部族角度对鲜卑族进行了研究。成果有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5期）等。在对鲜卑部族研究中，涉及最多的是慕容鲜卑部。成果有郑小容《慕容鲜卑名称详解》（《北朝研究》1992年2期），韩国学者金成淑《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3期）。学者们还对慕容鲜卑的封建化、慕容氏建国、慕容氏发式、慕容鲜卑音乐、慕容鲜卑与汉士族、与高句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见冯家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1935年3卷11期），金毓黻《慕容氏与高句丽》（《禹贡》1937年73卷1—3期），胡顺利《关于乌桓和鲜卑的“髡头”》（《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蒋福亚《论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3年3期），赵斌《鲜卑“髡发”习俗考述》（《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5期），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5期），黎虎、[韩]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

除以上对匈奴、鲜卑族较为集中的研究外，学者们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也多有涉及。相关成果有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3期），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赵向群《论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文史哲》1993年3期），胡昭曦《论汉晋的氏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历史研究》1963年2期），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上下篇，《民族研究通讯》1979年2期、1980年1期），王俊杰《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3期），张建昌《氏族的兴衰及其统治范围》（《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4期），周伟洲《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3期）等。

对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基本都认为该时期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在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接触中相互之间存在歧视、压迫甚至仇杀，民族矛盾突出，各族人民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更重要的是各族间互相学习、互相渗透，最后在汉族高度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达到融合。对于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陈可畏认为主要是当时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魏晋十六国统治者处理民族问题不当所造成的（《论魏晋时期中国北部的民族矛盾及其演变》，《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唐长孺对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原因，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及其统治政策，政策的作用以及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转化过程，民族隔阂的消失与民族融合的形成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证（《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冯君实从两晋时期的统治政策及历史发展的趋势等方面分析了五胡内迁的原因及作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论文还有蒋福亚《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斗争及其实质》（《民族研究》1980年5期），缪钺《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邢友德《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北朝研究》1995年3期），李红艳《读史释疑：兼论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矛盾的大势》（《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3期）等。

对于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学者们多是将其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史中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数，而且从理论研究到具体状况都引起热烈的讨论。冯君实以两晋南北朝为历史背景分析了民族融合的形成，并论及了十六国时期对民族融合形成的作用（《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1期）。相关文章还有高光晶《两晋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1期），

陈琳国《魏晋南北朝史上的三个问题》(《历史教学》1985年9期),李绍先、田远《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成都师专学报》1989年2期)。对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发展阶段,朱大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论及了十六国及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形成原因。高诗敏强调了通婚对于民族融合的加速作用(《黄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大融合》,《历史教学》1981年1期)。刘汉东则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大融合》,《北朝研究》1995年1期)。李红艳以信都冯氏为例,认为当时民族融合的另一模式即汉人胡化再汉化(《从信都冯氏看北方民族融合》,《北朝研究》1996年3期)。民族融合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对此赵向群分析了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美化趋势(《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美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1期)。相关成果还有黄烈《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3期),童超《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4期),罗宏曾《魏晋时期北方各族的迁徙与融合》(《历史教学》1981年12期),岑家梧《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2期),董旭《十六国北朝时期河北境内的民族融合》(《河北师大学报》1991年2期),童超《论十六国时期的“变夷从夏”及其历史意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茂盛、刘柏冬《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3期),张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与汉化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4期)等。

从政权角度研究某个民族的成果也很多。童超论述了成汉政权的性质及其统治政策(《论李特兄弟领导的武装斗争及成汉政权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2期)。关于成汉政权的研究论文还有漆泽邦《试论李特起义和成汉政权》(《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2期)等。杨伟立的《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成汉政权的著作。该著从西晋后期李特起义入手,论及了成汉政权的建立、发展、衰亡及其作用。齐陈骏从前凉政权的内外政策出发,探讨了该政权对河西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略论张轨和前凉张氏政权》,《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3期)。赵向群从前凉政权的性质出发,分析了该政权在河西的存在及其发展的情况(《前凉政权的兴替》,《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3期)。关于前凉的研究还有齐陈骏《略论张轨和前凉张氏政权》(《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3期)、侯灿《前凉年号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2期)、黎尚诚《前凉史事述论》(《西北史地》1984年3期)、胡志平《浅论前凉政权的用人》(《绥化师专学报》1988年1期)。

在对北凉的研究中比较集中的是对其年号的建置及相关问题。王素撰文论证了北凉建置年号的主客观状况及其规律(《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4期)。相关文章还有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1期)等。学者们对北凉政权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研究,主要有黄烈《北凉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一辑),林干《沮渠北凉略论》(《西北史地》1984年1期),黎尚诚《北凉鉴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期)等。

学者们研究还比较集中在南凉和西凉的问题上。对于南凉进行全面研究的是周伟洲《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相关论文有黎尚诚《南凉略论》(《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4期),郭峰《关于秃发南凉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4期),施光明《秃发南凉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剖析》(《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2年4期),米海平《略论十六国时期南凉文化》(《青海民族研究》2000年1期);关于西凉的研究成果有王育乐《西凉国考》(《北京日报》1961年6月20日),黎尚诚《西凉略论》(《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1期),薛宗正《西凉王朝的兴亡与西域》(《喀什师院学报》1999年1期)等。

此外,田居俭以“后赵灭亡的历史教训”为题探讨了该政权在石勒统治时期的主、客观条件及对其统治成功的作用。同时,深入分析了石虎时期的昏虐无道及内部相残造成后赵的灭亡(《后赵灭亡的历史教训》,《历史教学》1981年1期)。赵凯球从南燕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鲜卑慕容氏军事贵族与南迁青齐的河北门阀豪族入手,探讨了该政权的统治政策及影响(《南燕史钩沉》,《中州学刊》1986年2期)。韩国学者池培善《慕容德建立南燕的前前后后》(续)探讨了南燕历经邺城——滑台——广固的南迁过程(《北朝研究》1993年4期)。池培善关于南燕的文章还有《南燕与慕容德》(《文史哲》1993年3期)。

学者们对其他政权也有相应研究成果,如,邸富生《前燕初探》(《辽宁师院学

报》1981年4期)、王俊杰《西秦史钩沉》(《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3期)、齐陈骏等《氐人吕光和他的后凉政权》(《西北史地》1985年1期)、张金龙《北燕政治史四题》(《南都学刊》1997年4期)等。

将数个政权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十六国区域史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河西五凉的探讨。涉及成果主要有余尧《五凉史事述略》(《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3期),武守志《五凉政权与西州大姓》(《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4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6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五凉政权与中西交通》(《西北史地》1987年1期),何祖敏《五凉政权与河西开发》(《西部学坛》1987年4期),方步和《从谣谚看五凉的兴衰》(《西北师院学报》1986年增刊)和《斌论五凉的三个儒学中心》(《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2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5期)和《简析十六国时代河西成为北中国文化中心的原因》(《社科纵横》1992年5期),丁柏峰《西晋末年人口大迁徙对五凉政权的影响》(《青海师大学报》2000年4期)等。全面研究五凉政权的成果有齐陈骏《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四 史籍整理与考古

十六国时期的史籍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还有些史籍有待考证和整理,因此该时期史籍的整理与研究就相当重要。

《晋书·载记》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对《晋书·载记》进行分析、辨误是十六国史籍整理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冷鹏飞《辨祖逖石虎浚仪之战》(《中国史研究》1982年4期),邱敏《后秦姚氏兄弟生年献疑》(《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4期),吴钰钰《刘琨早期仕宦活动的年序考异》(《福建师大学报》1986年2期),陶新华《〈晋书·载记〉略论》(《贵阳师专学报》1995年3期),李之亮、许华伟《〈晋书〉、〈十六国春秋〉对勘札记》(《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3期),李琼英《辨刘裕七月灭后秦》(《文献》1999年1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晋书》札记部分等。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发表了日本“五胡”研究会的报告,认为“五胡”时代的“霸史”佚文收集工作意义在于以佚文与正史进行比较研究,可了解“霸史”的特性,或反之探讨正史的特性。同时也可依据这些佚文史料,开创一条从新视角把握“五胡十六国”史的新途径(《“五胡”时代的“霸史”及其佚文搜集工作》,《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96年版)。

《十六国春秋》无疑是研究十六国史既全面而又集中的史料,该书也因此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其中又以屠本《十六国春秋》最为引人注目,自20世纪以来该书一直是史学工作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对屠本《十六国春秋》的史料来源已有了较为确切的认识,使屠本《十六国春秋》成为十六国史研究中可以征信的重要史料。相关成果主要有赵俪生《〈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史学史研究》1986年3期),邱敏《〈十六国春秋〉史料来源述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2期),冯君实《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料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1期),邱久荣《〈十六国春秋〉之亡佚及其辑本》(《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6期),王薇《〈十六国春秋〉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3期),刘琳《明清几种〈十六国春秋〉之研究》(《北朝研究》1995年4期),庄华峰《汤球对两晋十六国史书的辑佚》(《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等。

关于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章还有邱敏《慕容皝迁都龙城年代考异》(《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4期)、刘建丽《〈中国史稿·十六国兴亡表〉订误》(《历史教学》1984年4期)、罗秉英《关于王隐〈晋书〉的评价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1期)、杨朝明《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史料价值刍议》(《齐鲁学刊》1987年5期)、曹书杰《王隐家世及其〈晋书〉》(《史学史研究》1995年2期)、屈直敏《夏赫连勃勃,国书〉考略》(《敦煌学辑刊》1997年1期)等。

考古资料在十六国史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百年来有关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主要有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2期),

《炳灵寺发现西秦石窟》(《文物》1963年10期),《武威发现慕容氏墓志》(《文物》1965年9期),秦烈新《前凉金错泥筒》(《文物》1972年6期),廖博《第一次发现的北燕墓葬》(《光明日报》1973年3月6日),黎瑶博《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

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5期), 吉发习、丁学芸《鲜卑考古拾零》(《实践》1979年9期), 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费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4期), 钟长发、宁笃学《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2期), 《河北正定县出土前燕元玺四年刻字墓砖》(《文物》1981年3期), 李宇峰《朝阳发现十六国时期后燕崔通墓碑》(《文物》1981年4期), 吉林省文物队等《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 周铮《大秦瓦当释》(《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 李力《北凉石塔》(《文物天地》1992年2期), 武威市博物馆《甘肃武威十六国墓葬清理记》(《文物》1993年11期), 林仙庭、宋协礼《山东牟平发现十六国时期文物》(《考古》1994年2期), 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11期), 璞石《辽宁朝阳袁台子北燕墓》(《文物》1994年11期), 辛发、鲁宝林、吴鹏《锦州前燕李魔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6期), 《辽宁锦州市前山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清理》(《考古》1998年1期), 徐海峰《三世纪至五世纪河套及大同地区鲜卑考古遗存述论》(《文物春秋》2000年期), 等等。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几乎包含了各个政权、民族的遗迹, 但对这些资料的实际运用稍嫌不足。

五 小 结

本文对20世纪的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状况作了大致的归纳, 从民族关系方面的汉化与民族融合, 思想文化方面的儒学及宗教传播, 社会方面的阶级、阶层研究, 到史籍的整理与研究、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等, 所获成果之多、成就之大皆令人振奋。尤其是一些重要问题都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并得到或接近令人满意的结论, 如少数民族贵族与汉族士族的矛盾与合作问题, 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民族融合问题, 流民问题, 儒学与宗教的传播, 国别史与区域史研究, 屠本《十六国春秋》研究等。

尽管十六国史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十六国宗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佛教研究, 其它各种宗教的研究还很薄弱。二是十六国区域史研究集中于河西五凉, 而对于五燕等区域的研究还没有涉及。三是十六国考古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于各方面的研究中还稍嫌不足。四是缺乏对屠本《十六国春秋》的整体性校勘, 致使该书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 经过学者的百年努力, 十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民族关系史、史籍整理及考古研究成果颇令人欣慰, 相信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 相关研究将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写作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 再有, 在引用或表述学者们观点时可能有认识不足及错误之处, 敬请多予指正。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